**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歌曲被大陆官方逐渐接纳的时代背景分析**

张鸿琳 2019012137 电子系

2009年，中国网举办“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网络评选”活动，评选分文学、影视、音乐、美术、戏剧、舞蹈、曲艺、文化学者8类，共192位候选人，邓丽君以850万余票的得票数位居榜首[[1]](#footnote-1)。然而正是这样一位被称颂为“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的现象级歌手，她的歌声被大陆官方接纳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的邓丽君，在1967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邓丽君之歌——凤阳花鼓》，正式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并于1969年因演唱台湾首部连续剧《晶晶》的同名主题曲而在台湾走红。在1967-1976这几年中，邓丽君处于台湾宇宙（1967-1971）以及台湾丽风、香港乐风时期（1971-1976），该时期邓丽君的歌曲多为天真俏皮、曲调流畅的爱情歌曲，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被传唱至今，比如《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歌词中“记着我的情记着我的爱，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以朴素的口吻描写了少女与恋人分别时的希望他要专一的嘱托，表达了真挚且纯洁的爱情，该曲就是邓丽君该时期风格的真实写照。

而此时中国大陆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部文化大革命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外部中国正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的夹缝中，且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爆发矛盾，同时中美关系仍未得到改善，所以国家对外政策由“一边倒”的亲苏倾向，转向“两条线”的反帝、反修政策，既不亲苏也不亲美，这导致该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处于两面受夹击的困难局面[[2]](#footnote-2)，举国上下都处于政治高压中。因此该时期出现的文艺作品很多都服务于政治，这段时间流行的政治化歌曲大约可以分为：歌颂领袖的歌曲，比如《东方红》；杀气较重的“造反歌”（造资产阶级、反革命、封建的反），比如《革命造反歌》；激昂的“红卫兵”歌曲，比如《卫东》、《完蛋歌》；“自骂歌”（用于戏谑被批判者的歌曲），比如《嚎歌》；描写社会向着胜利迈进的歌曲；内涵丰富的“知青歌曲”[[3]](#footnote-3)（老师课上对文革时期歌曲的大致分类为：喊口号和克服奴性的歌曲、忆苦思甜与憎恨旧社会的歌曲、阶级斗争与新希望的歌曲、知青爱唱的几类歌曲、样板戏等）。这些歌曲多是以群众的、大众的、革命的角度来抒发情绪的歌曲，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我意识，难以将个人情感投入。

由此可见，由于该时期大陆特殊的政治背景，成长于台湾的邓丽君的歌曲风格与内容就显得和大陆的歌曲格格不入，加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岸关系反复无常，而国民党致力于将邓丽君塑造为“军中情人”，把她当做反共宣传利器，因此邓丽君的歌曲在这个阶段无法被此时的大陆官方所接纳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在文革时期民众通过收音机收听“敌台”有可能面临劳改或判罪，所以邓丽君的歌曲在民间也基本没有流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美关系逐渐走向缓和，标志事件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因此我国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发生变化，变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我国的外部危机，不再两面作战，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且中美关系缓和也促使我国摆脱了长久以来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4]](#footnote-4)，同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在七十年代中期也走向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紧接着1978年，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压力的逐渐消退以及生产力的解放使得大陆的艺术文化开始逐渐恢复百花齐放的繁荣，减少了和政治的相关性。

这个时期，海内外交流日渐增多， 通过收音机收听港台音乐也不再是稀奇事，很多港台音乐磁带也得以通过私人携带的方式来到大陆。长久耳濡目染了文革与冷战时期比较政治化的音乐的民众，在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后应该都会为之触动且亲切：她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戏曲中的优点，形成了一种优美流畅、温婉圆润且富有民族特色（她学习了地方小调的传统唱腔）的演唱风格，将民族性与流行性融合于自己的歌声，她唱歌时还注重于细节打磨，使人甚至无法听到她的歌曲中的换气声[[5]](#footnote-5)，她的歌曲内容也让人深感亲切——很多都是描写轻松愉快的男女爱情，而且在那个年代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对台统治，实行“中国政治文化”，把北平话定为了台湾官方语言，因而邓丽君的歌曲很多也是咬字清晰的国语歌，使得其歌曲在中国大陆的传唱基本不存在语言障碍。可以说，饱含着个人情感体验的邓丽君的歌声恰恰是那个年代的大陆民众所热切期盼的声音。当时国外还报道过一个趣闻：1981年，中国乒乓球队在赴日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途中，因飞机故障于台北某机场紧急着陆，中国乒乓队的一些队员匆匆忙忙地挤进了免税商店，他们所要购买的物品不约而同都是邓丽君的歌曲磁带。著名乐评人金兆均曾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北海公园和北海后门山上经常办舞会、听音乐，听的主要就是邓丽君”[[6]](#footnote-6)。足可见邓丽君的歌声在大陆民众中逐渐传唱开来且备受欢迎，此外一些大陆的歌手也开始学习、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等，中国大陆歌曲的唱法由本来的民间唱法、“民族唱法”等又逐渐引入了邓丽君的“气声唱法”。

虽然该时期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民众间广为流传，但大陆主流音乐界仍未接纳邓丽君。1980年，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在北京召开了一场针对当下流向音乐取向的讨论会，称为“西山会议”，会上一些专家对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表达了否定观点，称其是含低级趣味、反映腐朽颓废情调的萎靡不振的乐曲，尤其是邓丽君翻唱的《何日君再来》被批评为资本主义社会落后产物，因此会后，邓丽君的歌曲被冠上了“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称呼[[7]](#footnote-7)。这次会议表明了大陆主流音乐界对邓丽君歌曲的态度，从侧面说明大陆主流音乐界还未从一些政治宣言式的“高强硬响”音乐模式中完全解放出来，在音乐赏析时容易掺杂政治情绪，不能很好地紧跟人民的艺术文化需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在该时期，大陆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放松，且由于1979年大陆发出的倡议结束两岸军事对峙、扩大两岸交流的《告台湾同胞书》、1984年“一国两制”的提出以及1992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达成，两岸关系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也较为缓和。

此时中国大陆官方对港台文化已经逐渐敞开了怀抱。在该时期中国唱片总公司整套引进并出版了邓丽君歌曲磁带系列，大受民众的欢迎。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目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是中国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新闻采访报道，标志着邓丽君被大陆主流舆论逐渐认可。1988年，中国大陆有关机构甚至发出了邀请邓丽君来大陆进行音乐活动的信函，不过可惜的是由于邓丽君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台湾当局的不支持，这次邀约未能成行。虽然邓丽君未能如愿来到大陆开展演唱会，但是如上种种已经意味着邓丽君的音乐开始被大陆主流所接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中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海内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邓丽君及其音乐作品在大陆逐渐解除了几乎所有限制（除去一些政治色彩较浓的歌曲），因此邓丽君该时期在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1995年5月9日，CCTV-4报道了“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病逝”的消息，这是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新闻媒体对邓丽君的首次报道，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次历史性的报道带来的却是这位现象级歌星陨落的消息[[8]](#footnote-8)。在这之后，邓丽君的作品与画面便常常出现在大陆的各类主流媒体上，邓丽君的音乐终于被大陆官方完全接纳。

**【总结】**中国大陆主流音乐界与官方对邓丽君的音乐的态度的转变——从排斥反对到逐渐缓和再到欢迎认可，横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这种转变是中国大陆时代背景变更的反映，也是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的部分缩影。总体而言，中国大陆官方对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的接纳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迈进，我国内地的音乐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所包含的元素越发丰富。不过近年来内地音乐也存在着不少急功近利、妄图抄近道的抄袭、低质现象，一些所谓的歌手不潜心钻研歌唱技巧，总是试图“扩展赛道”，投入大把捞金的行列，这时人们或许在不经意间再听到邓丽君的歌曲时，又会想起那个经典歌曲层出不穷的年代，并不禁慨叹道：何日君再来？

1. 《过往的邓丽君》，鹰瞳世界。 [↑](#footnote-ref-1)
2. 《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张小明。 [↑](#footnote-ref-2)
3. 《“文革”歌曲的时代烙印》，梅宏。 [↑](#footnote-ref-3)
4. 《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张小明。 [↑](#footnote-ref-4)
5. 《华人音乐史上的传奇巨星 一代佳人邓丽君》，第一星座网。 [↑](#footnote-ref-5)
6. 《邓丽君音乐的中国大陆传播史》，凤凰资讯。 [↑](#footnote-ref-6)
7. 《邓丽君在大陆：从被禁到解禁》，九个头条。 [↑](#footnote-ref-7)
8. 《邓丽君音乐的中国大陆传播史》，凤凰资讯。 [↑](#footnote-ref-8)